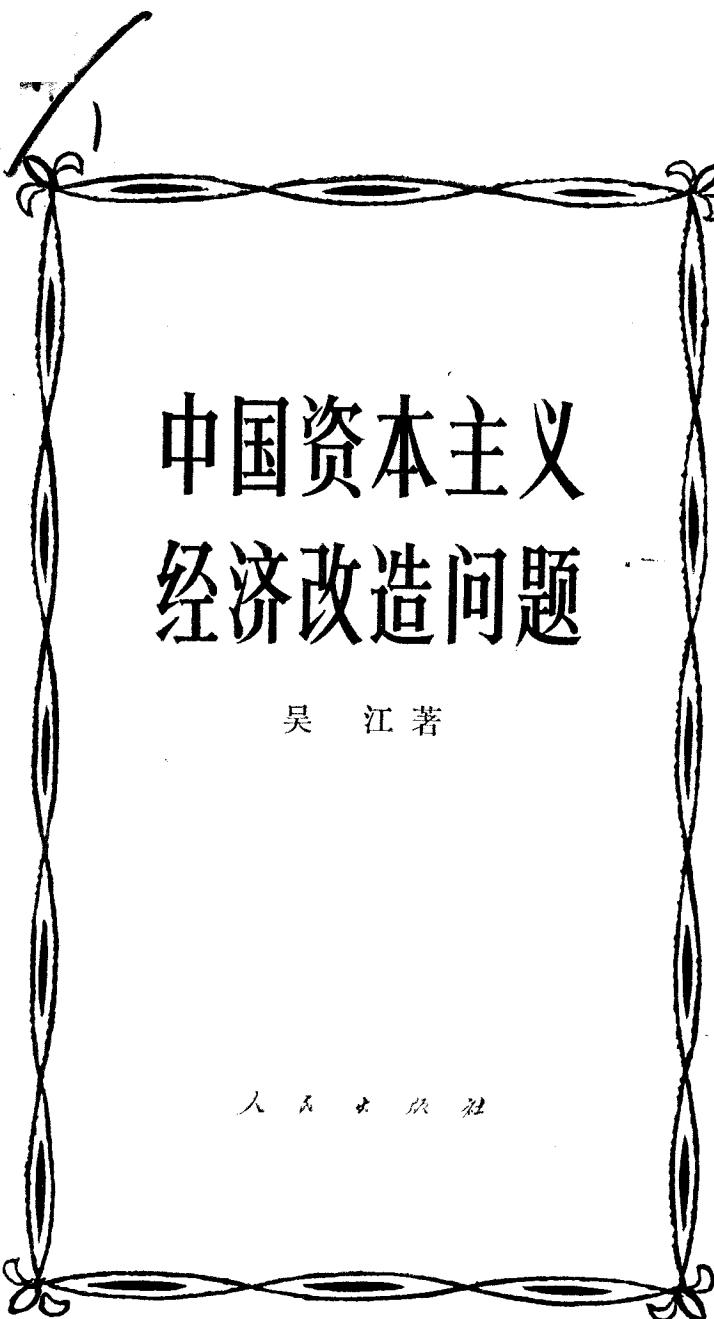


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改造问题

吴 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改造问题

吴 江 著

人 民 大 公 社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

吴 江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63,000 字

1958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2 版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4,501—18,000

书号 3001 · 541 定价 1.15 元

再 版 前 言

现在重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在 1955 年，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行将到来的时候开始动笔，1957 年脱稿，次年和读者见面的，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据我所知，这是当时专门记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第一本书，大约在四年之后，才有别的专著问世。因为是第一本书，而且几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基本完成的同时写就的，未免有些匆忙，因此难免粗糙。但今天看来这本书也有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比较完整地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过程，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原始资料。因此，它对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可能还有参考价值。这次重版时只对个别问题作了一些增补和节删。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并没有中途停顿下来，并没有认为我们的社会只有经过依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那样一个阶段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胜利后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基础上不间断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领导我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独立地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曾设想过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过一组文章《流亡者的文献》，

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即认为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才能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那种水平。恩格斯这一观点反映了直到十九世纪末历史发展的一个事实，因为直到那时为止，社会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里才发展到近代的高度。但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的革命形势，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从经济发达的国家开始，而是从经济不发达的个别国家开始。世界历史程序在这里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离开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那条固定道路。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得政权并凭借这个政治权力，不依靠于资产阶级（当然仍借助于资产阶级所已达到的成就），开始自己动手创造足以实现社会主义并进而达到更高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尽管这是逐步的、长时期的。

我们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我国的民族资本发展水平本来就很低，在人民已经当权的条件下更暴露出它本身具有的弱点，因此陷入重重困难。我们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步骤，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于这种企业生产力的解放，使之渡过困难，并得到某种发展，以与新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里是指全行业公私合营步骤的完成），这一部分企业生产力基本上溶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们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是伤害了资本主义这部分生产力，而正是拯救和利用了资本主义这部分生产力并使之得到某种发展（例如，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的1956年，这七年中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增加了将近一倍）。我们在工作上也发生过某种失误，那不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前，主要发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过早过急地进行企业

的大合并，盲目地集中那些适合于采取自负盈亏方式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小工商业户，不容许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存在，因此未能保持城市工商业的必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在我国现有生产力状况下是必要的），以致对生产、就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合营中，将相当一批非资本的小工商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不加区别地作为“资产阶级”对待，也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这些本来是我们党在完成公私合营步骤时就指出应当注意避免（参看本书第四章第六节）而终因滋长“左”的倾向而未能避免。但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党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改造，对于利用和推动这部分生产力的发展，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的。

也许有人问：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起步的，我们在胜利后如果有一整个时期让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让它获得较大的发展，不立即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或者只是“利用”而不同时进行限制和改造，那是否会对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更有利些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以事实作了回答。由于当时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迅速增长起来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迅速增长起来的矛盾，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这样三位一体的政策，促使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让其自发发展，显然是不适当的；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按照各自的本性和面貌并存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及时推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那末，速度可不可以放慢一些呢？我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于 1950 年，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共进行了七年。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孤立进行的。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是由当时各种条件特别是由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显然过急的步骤促成的，步子是稍快了一点，因此遗留

下来一些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本身说来，问题主要不在于速度（七年时间并不算太仓促），而在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的某些措施。总的说来，这些缺点不妨碍我们足够肯定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及其意义。无产阶级用和平手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

我国有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出现象租让企业或与外国资本家合营等形式。我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国家，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一部分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这一部分外资企业，首先取消其特权，使之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然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采取“征用”、“代管”、“转让”等方式，其中又主要是“转让”的方式，解决这些外资企业的产权问题，使之转变为中国的产业，消除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痕迹。这个工作于 1962 年基本完成。这个问题本书没有涉及。

在我国过渡时期，不同性质的多种经济成分（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个体小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1956 年已经基本结束。1956 年以前的所谓“并存”局面，并不是说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平行发展。所谓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这个局面是指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并使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下，进行不同的逐步改造的过程。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互相斗争和互相消长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不稳定的，是充满着矛盾和复杂斗争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不同性质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也就基本结束，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基本上建立了起来。现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二十多年之后，我们有时又遇到有所谓“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样的提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必须指出，这和过去所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不能解释为退回到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种状态去，这两者决不能混淆。现在所谓“多种经济成分”（换一个提法，例如提“多种经济形式”，也许更恰当些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形式或多种经营方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两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各种联系形式，这两种所有制经济内部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经营方式等等；同时，也包括少量的个体经济，但这种个体经济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它不再象过去那样能够成为一种有独立存在意义的经济形态了。至于现在我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或个人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这和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性质上也有原则的区别，同样不应当混淆。

吴 江

1981年12月

作 者 的 说 明

本书从1955年春季动手，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的写，到1956年年底脱稿。开始时没有料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会来得那样快，所以其中有些在高潮前写好了的章节，在高潮过后不能不完全重写。第一、二、三章曾经在《经济研究》（1955年第五期、195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发表过。1957年上半年抽时间将本来是独立写的各章作了一番编辑修正工作，删掉了一些重复的地方，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付印。

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大题目，本书只限于说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而把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排除在外，所以是不完全的。作者的用意是想概略地考察一下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改造过程，并且尽可能对和平改造中的一些问题加以分析，讲的是经济，着眼点还是在政治，企图借此说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并不是专搞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修养也差，只是抱着尝试和学习的态度来写这本书，虽然勉强写成，其中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现在印出来，是为了抛砖引玉，同时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吴 江

1957年10月15日

目 录

再版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	1
第一节 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	1
第二节 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性	17
第三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和软弱性	36
第四节 关于第一章的结论	53
第二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	57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经济基本问题	57
第二节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	64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作用	85
第四节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和平改造的社会条件	100
第三章 资本主义怎样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114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115
第二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133
第四章 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153
第一节 工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及其所 采取的形式	153
第二节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165
第三节 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及其局限 性的分析	185
第四节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个别企业 的公私合营	204

第五节	公私合营从个别企业到全行业的发展	225
第六节	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245
第五章	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259
第一节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一般问题	259
第二节	批发商业的排除和改造	269
第三节	零售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281
第六章	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人的改造和企业 改造的结合.....	296
第一节	历史的简单回顾	297
第二节	和平改造时期的斗争	304
第三节	人的改造和企业改造的结合(一)	316
第四节	人的改造和企业改造的结合(二)	326
第七章	结束语	338

第一章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中的若干特点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它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被改造，走过了自己的一条独特的道路。为了说明我国过渡时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这里首先要把这个经济的历史情况简单地、有重点地叙述一下。这样做是为了揭露它的若干特点，而不是全面地考察这个经济。这里要涉及的是下面三个问题：（一）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二）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性；（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面貌。

第一节 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的一般过程

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晚许多年。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经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中国由封建社会渐次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

程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情况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要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产生原是极早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和其它封建社会一样，存在着逐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必然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经济。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这就是（一）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二）工场手工业，（三）大机器工业。这在中国也是如此。就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产生的时期来说，中国并不比西欧国家为晚。在中国这种现象，我们从封建社会的后期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在明代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由发展了的商品经济所促成的相当广大的国内市场（拥有几十个大商业城市）和日益开拓了的海外市场。在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那时，主要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在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磁业和制茶业等行业中，已经存在着一些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作坊、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已在开始组织着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并且促使着农产品逐渐商品化。虽然，其间经过清朝征服中国毁坏了大量的生产力，一度造成中国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但是不久，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在整个社会生产恢复并有发展的基础上，不但已经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工场手工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不仅在地区上有扩展（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全国各地扩展），并且还扩及到更多的行业。商业资本进一步组织着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业，控制手工业生产和运销过程。商品经济不仅支配着城市，在有些地方并已日益侵入农村，商品作物在排挤着粮食生产。货币作为彻底平均主义者促使土地更迅速地卷入了流通过程，使农村关系进一步发生新的变化。在统治阶级和地主富农高利贷者互相结合的严重剥削和压迫下，已经在扩大地演着

农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土地日益相分离的过程。从经济观点看，这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所需要的某些物质条件。

但是，从后来所达到的实际结果来说，中国社会却没有迅速地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没有引起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同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比较起来，中国还是落在后面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过于迟缓和落后，至今还是待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某些特殊因素及其所起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家长制的农业经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特别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制度阻碍着商业资本对于旧生产方式的分解作用（商业资本对于旧生产方式有多大分解作用，首先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阻碍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从而阻碍着国内市场的正常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始积累类型的商业资本，又是一种同封建地主经济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从地主那里抄袭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办法，它不但未能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有力的对立物，相反，却常常成为它的附庸。很大部分商业资本乃至手工业者从事于土地剥削活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自己兼为地主或完全转化为地主。同时，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长期存在着劳役制的残余，生产规模狭小，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这种情况阻碍着技术的发展和自由契约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封建所有制的上层建筑——封建专制统治十分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中国的最腐朽最顽固的封建势力运用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包括工商从业者）实行最残酷的落后的统治与掠夺，这个国家权力对于民间工商业采取横征暴敛、课以重税（地方关卡林立）、立法限制、官营垄断、甚至在工人中建立严密的保甲管理制度等办法，来压抑它的正

常发展，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来排除和代替封建生产方式。

正由于上述这些特殊性因素及其他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在一个时期反复地纠缠在下述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在极残酷的封建统治下不断破产，不断演着同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过程，有的被迫流向城市，但由于城市中工商业的被限制而不得迅速发展，仍长期找不到足以容纳这批被农村抛出的劳动力的相应的市场；另一方面，在受封建统治者多方限制和压迫的城市手工业作坊中做工的工人，由于面对着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情况，他们的待遇也就不能得到改善，只好被迫长期处于极端恶劣的雇佣条件下，忍受着饥饿、贫困和过度的劳动，使精神和身体越来越萎缩，如此也就更加阻碍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这一切使得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起来。

中国社会内部包含着克服这种矛盾的因素。到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使这种因素逐渐增长起来，形成对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冲击力。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冲击的序幕。但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既然已经侵入中国，把落后的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了。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度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原有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造成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此时不仅工场手工业有新的发展，大机器工业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可供它们长期无限制地剥削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特别当世

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更是如此。为此，它们就不能不竭力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作为它们侵略中国的支柱）和培植买办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阻止其独立发展。这就使得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也就不能不按着自己独特的畸形的形态发展了。

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考察的。循此常例，我们暂且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五个段落来考察。

（一）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的五十多年期间。这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这个期间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以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用多次侵略战争和各种不平等条约打开并扩大中国市场，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范围。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贸易居住权（始于1842年），内河航行权（始于1858年），铁路建筑权（始于1863年）和设厂制造权（始于1895年）等，都在这个时期内先后获得，成为外资侵略的重要基础。从1858年起，中国全部海关已被外人所控制，实行殖民地管理，为外国资本的侵略洞开大门。而1844年由美帝国主义创始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又将一国所获的特权普遍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国资本并开始先于中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进行投资，这些工业，主要是为在中国掠夺原料和特产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便利在中国发展运输而经营的航运业和船舶修造业，为发展其在中国强占的商埠而经营的公用事业及若干轻工业（据估计，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所雇佣的中国工人已有三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国近代工业工人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外国银行也先于中国银行在中国出现。

外国资本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提出了中国封建

统治的存亡问题。旧统治者妄想原封不动地维持旧生产方式是不可能了，他们被迫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860年以后，中国一部分所谓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在“新政”的名义下，从军事工业和交通企业着手，开始在中国经营近代企业。例如，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局，1865年上海设机器厂和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船政局，1872年设招商局，1878年设开平矿务局，等等。中国封建统治者经营近代企业，一开始便依赖外国资本并受其支配，阻碍民族资本的活动和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1870年以后才开始缓慢地生长起来。其时，一部分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开始在新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方面进行投资。据初步收集的资料，从1872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止，二十余年间，民族资本前后共创办了一百多个企业（其中有些失败了），这无疑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新生力量，对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时这种投资不仅为数极少，力量微弱，而且一开始便处于外国资本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之下。外国资本主义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并把持我海关大权，限制进口税，以贬低价格的办法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国内封建官僚势力则除了采用官营、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独占办法控制民族工商业（主要是当时比较能获利的棉纺织业等）外，更以敲诈勒索、抽厘征税、关卡林立等办法限制民族工商业的自由活动，使之在市场上根本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有些由于条件困难，经营腐败，结果还是不能不依赖于外国资本，或最后仍逃不脱“官”的魔掌而受其支配。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便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当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已因此有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例如提出海关自主，要求增加进口税、减少出口税，等等。

（二）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1911年），即从十九世纪末到